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主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论衡选译

修订版

译注 黄中业 陈恩林

审阅 许嘉璐



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主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论衡选译

修订版

译注 黄中业 陈恩林

审阅 许嘉璐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衡选译 / 黄中业, 陈恩林译注.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5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ISBN 978-7-5506-0427-8

I. ①论… II. ①黄… ②陈… III. ①古典哲学—中国—东汉时代②论衡—译文 IV. ①B234.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6102号

- 书 名 论衡选译
译 注 者 黄中业 陈恩林
责任编辑 王华宝 李艳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9号 邮编 225008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168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427-8
定 价 22.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4-85868858)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周 林

邓广铭

白寿彝

主 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编 委

(均按姓氏笔划多少排列)

马樟根 平慧善 安平秋 刘烈茂 许嘉璐

李国祥 金开诚 周勋初 宗福邦 段文桂

董治安 倪其心 黄永年 章培恒 曾枣庄

(以上为常务编委)

王达津 吕绍纲 刘仁清 刘乾先 李运益

杨金鼎 曹亦冰 常绍温 裴汝诚

(以上为编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修订版 出版说明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是2011年的修订版。全书共134册,包括了从中国从先秦至清末两三千年间的著名典籍。每部典籍都选其精粹(《论语》《老子》则全文收录),收录原文,加以简明的注释,力求准确地译为现代汉语,并于每一篇之前写有对该文的提示性说明。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收录种类相对齐全、译注质量较高的一套普及传统文化的今译丛书。

这套丛书,原在1992年—1994年由巴蜀书社分三批出齐,印行过万套;不久,又由台湾的出版机构买去海外版权在台湾及海外发行,可见这套丛书当年在两岸受欢迎的程度。时隔17年,丛书编委会

决定重新修订，改由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所属的凤凰出版社出版。

这套丛书是由教育部属下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于1985年策划的。古委会组织了全国18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所长任编委会编委，由我们三人任主编，在全国范围内选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各书的译注。从1986年—1992年，历时7年完成。当时，编委会制订了严明、可行的体例和细则，译注者按要求完成书稿。每部书稿完成后，都在全国范围内请编委会之外的专门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两位专家初审，合格后再请两位编委参照初审意见审改，然后退还原译注者改正。待原译注者改正后，再由编委会集中常务编委和部分编委、相关专家在一地将每部书稿从头至尾审改。这样的集中审稿会一般都在8—15天，7年中开了12次审改会。审改后，三位主编再集中在一起逐一审定，交付出版社。这一工作程序，使得这套丛书的译注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所以，这套丛书，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与多人合作的结果。关于这套丛书的编纂始末，我们曾在1992年4月全书交稿后写有一篇文章，这次附在修订版书末，便于读者了解。

这次修订,是交由原译注者自己修改。少数译注者已去世,则书稿一仍其旧。个别译注者已联系不上,也保持原貌。

1992年—1994年出版时,书前有当时古委会主任周林先生写的序。周林先生是这一丛书的发起者。他已于1997年6月去世,至今已14年了。为了尊重历史,也为了纪念他,修订版仍用他的序。

我们三人在1985年—1992年主持这套丛书工作时,年龄大的是从51岁到58岁之间,年龄小的是从44岁到51岁之间,那时尚有精力组织、参与这一工作,今天我们都已年逾古稀。全书修订版出版之际,心情似乎比当年更惴惴不安地期待着读者的评头品足,期待着不要对读者贻误太多。

回想这套丛书,真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这样深厚、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使我们今天仍然受用无穷。应该感谢这套丛书的全体译注者、审阅者、编委和当年的出版者巴蜀书社、今天的出版者凤凰出版社,是他们的学识、辛勤与真诚使得这套丛书得以面世。

章培恒 马樟根 安平秋

2011年3月15日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

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1986年5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1987年5月和7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1987年7月6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

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1987年10月于北京

前 言

《论衡》是东汉前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倾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汉和帝永元中（89—104）病逝，享年七十岁左右。

王充出身“细族孤门”，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先祖因从军有功，受封于会稽郡阳亭，后失去封爵。祖父王汎，因“横道杀伤，怨仇众多”，携家徙居钱塘（今杭州）。父王诵，在钱塘又因与“豪家丁伯等结怨”，迁徙浙江上虞定居。

王充八岁进学馆学书法，十五六岁时赴洛阳太学求学，从著名史学家、古文经学家班彪学习。他

“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

大约在三十二岁以后，王充返归乡里，先后担任上虞县功曹、会稽郡都尉府掾功曹、郡太守五官功曹从事（五官掾），因与长官政见不合，被“废退穷居”，以教书为业。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登花甲的王充到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等郡避难，应刺史董勤之召，到州里任治中（州刺史的助理）。章和二年（88），王充罢州家居，友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极力推荐，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王充晚景凄苦，“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自纪篇》），处境艰难，唯以著书为事。

据《论衡·自纪篇》，王充一生所著书籍，有《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等多种。但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论衡》一部。学术界有人说王充的《讥俗》、《节义》、《政务》、《养性》诸书已混杂于今本《论衡》中；有人说这些书的基本内容和观点虽然可在今本《论衡》中探知，但它们已经佚失了，今本《论衡》不包括它们^①。

① 参见蒋祖怡《王充卷·自序》。

今本《论衡》有三十卷本和三十五卷本两种，皆为八十五篇。其中第四十四《招致篇》仅存篇目，无正文，实存八十四篇。

王充生活的时代，正当东汉王朝的前期，汉光武帝刘秀吸取西汉末年暴发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的教训和西汉统治的经验，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我国的封建社会因此而进入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刘秀继承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神学体系，并大肆宣扬西汉后期流行的谶纬迷信，强化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他还说自己所以能当皇帝，就是因为应了“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的谶言，因而提倡用谶言决疑。凡“名应图策”者，都可以享受高官厚禄。到汉章帝建初四年（79），章帝亲自在洛阳白虎观主持召开了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参加的大会，“讲议五经同异”（《后汉书·章帝纪》）。根据会上的辩论写成的《白虎通义》，就是融合儒家经书与谶纬迷信为一体的作品，它集中地表达了东汉统治阶级封建专制主义

的正统思想。与此同时，一些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知识分子，由于从自身所接触的下层社会的实际出发，批判地吸收古代思想中的优秀遗产，并正确地运用汉代所取得的自然科学成就，因而能在更高的思想文化层次上维护封建统治，批判和否定唯心主义神学目的论及谶纬迷信思想。王充的《论衡》和他前辈学者桓谭的《新论》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桓谭及其所著《新论》坚持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论，激烈反对“天人合一”，“极言谶之非经”提出治国应以“仁义正道为本”，因此被刘秀斥为“非圣无法”（《后汉书·桓谭传》），几乎杀头。王充继承并发挥了桓谭的思想，更加旗帜鲜明地向唯心主义神学目的论及谶纬迷信思想提出了挑战。

王充《论衡》一书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朴素的元气自然论。

元气一名，始于《春秋繁露·王道》和《淮南子·天文训》，被认为是天地所由产生的元始的气。元气与气相联系，说明它是由先秦诸子的气概念发展来的。但是，在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中，由元气组成的自然之天变成了“聚众精以自刚”的神灵之天，具有了道德和灵性。天所产生的万物，都是有

目的的，即“天生五谷以养人。……天之常德，在于利人”（《春秋繁露·止雨》）。后来，谶纬家把董仲舒的这种思想进行神学的解释，说“中宫大帝……含元出气流精一也”（《春秋文曜钩》），认为元气是由神产生的。

王充则不然，他在《论衡》一书中对元气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元气是自然界的本原、天地间的一切，从天上的日月星辰，到地上的飞潜动植，都是由元气构成的。“天地合气”产生万物，产生人类（《物势篇》）。自然界的物类所以千变万化、各不相同，就是因为构成它们的元气不同。如，“日者，火之精也”（《感类篇》）。“雷者，太阳之激气也”（《雷虚篇》）。“万物之中有智慧”（《辨崇篇》）的人，是“阴阳气也”（《订鬼篇》）。元气构成天地，万物生长于天地之间，受元气支配。万物生时“禀气于元”，万物死后，“复归元气”（《论死篇》）。天地作为由元气组成的物质实体，没有口目，没有嗜欲，没有意识，是自然无为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天地“无心于物而物自化，无意于物而物自生”（《自然篇》）。

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在唯心主义神学目的论大肆泛滥的汉代，正如黑暗中燃起的火炬，闪烁着真

理的光辉,有力地批判了统治阶级把天奉为造物神的正统思想。

王充进一步说,天地间的一切自然灾变也是由元气的变化产生的。“灾变时至,气自为之”,“气变之见,殆自然也”(《自然篇》)。并不是什么天对人的谴告,他说所谓天能谴告人的说法,不过是“衰乱之语”,是儒生们主观臆造出来的。这就揭示了“天人合一”的神学目的论的虚伪性。

王充运用元气自然论来观察认识事物,坚持了一条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汉代谶纬神学的认识路线,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们说“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实知篇》),能“生而知之”。在他们看来,圣贤人物的知识是先天的,不是后天学习得来的。先知者有“达视洞听之聪明”,能够预见“方来(未来)之事”(《实知篇》)。王充反对这种先验论的观点,说“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实知篇》)。圣人、贤人所以能先知,原因在于他们事先对事物进行了“阴见默识,用思深秘”的细致观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达视洞听之聪明”(《实知篇》)。王充指出:“世间之物,可思而